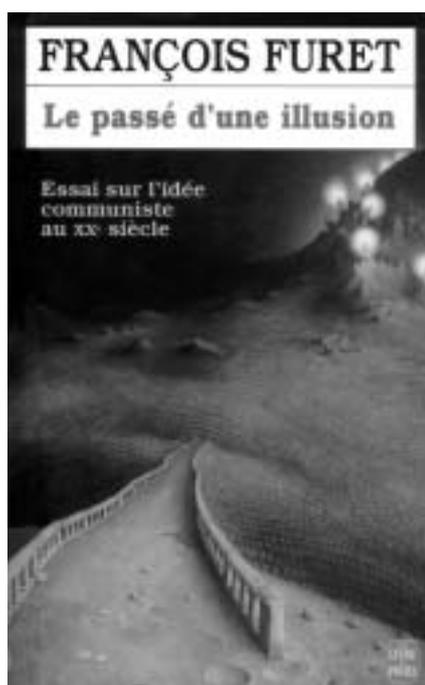


# 共產主義從烏托邦到極權主義 —— 讀《一個幻象的歷程》

● 陳 彥

《一個幻象的歷程》的特點是將共產主義看作是一個具有震懾人心力量的幻象，並將其放到整個二十世紀政治、思想演化脈絡中去剖析透視，勾勒出這一幻象發生、成形、衰變和幻滅的歷程。



François Furet, *Le passé d'une illusion: Essai sur l'idée communiste au XX<sup>e</sup> siècle* (Paris: Robert Laffont/ Calmann-Lévy, 1995).

在新舊世紀轉折之際回觀正在逝去的二十世紀，共產主義思潮及其實踐無疑是二十世紀人類社會最重要的歷史運動。然而從該思潮興起、傳布，然後付諸實踐又迅速衰亡的歷程看，共產主義思潮又不啻是一道貫穿二十世紀始終的虛幻的光暈，它曾經激起人們無盡的嚮往，但歷史最終證明它僅僅是一個幻象而已。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傅瑞 (François Furet) 於1995年推出的新著《一個幻象的歷程——論二十世紀共產主義思潮》(以下簡稱《歷程》) 就是一部企圖對這一幻象的歷史進行描述、分析、把握的著作。

傅瑞是國際公認的法國大革命史權威，但此次他卻將研究的重點轉向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思潮。以法國大革命史家「客串」共產主義運動史，《歷程》引發出一系列發人深省的啟示。該書的特點是將共產主義看作是一個具有震懾人心力量的幻象，並將其放到整個二十世紀政

治、思想演化脈絡中去剖析透視，勾勒出這一幻象發生、成形、衰變和幻滅的歷程。通過對這一歷程的高屋建瓴的描述，作者不僅分析了這一幻象如何能激起西方知識精英的嚮往之心，而且對共產主義由思潮轉為實踐，並以強大的實踐手段來維持幻象的機制給予了充分的揭示。

準確來說，《歷程》是一部歷史哲學論著，是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淡出歷史舞台之後第一部全面反思共產主義歷史的著作。通過反思，作者同時對二十世紀的重大歷史事件如兩次世界大戰，對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及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的異同等，作了獨到的研究和精辟的闡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該書是法國少見的鴻篇巨製。該書出版後，在法國及歐洲很快就引起強烈反響，由它所引發的關於烏托邦、極權主義等方面的討論正在法國展開。隨着討論的展開，該書的意義也應該漸漸清晰的顯現出來。本文無意全面詳論此書，僅介紹幾個較重要的觀點，並在此基礎上談談我的一些看法。

## 從法國革命到十月革命

《歷程》一書的作者是法國大革命史專家，他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開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的一代新風，尤其是將政治運動、思想嬗變推到研究的前台，傅瑞揭示出意識形態在法國大革命演進中的重要作用。在法國，法國革命研究一向與政治黨派關聯甚密，傅瑞1956年前也一

直是法共黨員。不過，他的過人之處是在此領域力倡獨立思想傳統，將法國革命研究帶出法國的左右政治鬥爭框架，一反對大革命要麼全盤肯定要麼全盤否定的模式，主張對大革命作具體分析。他以實證的研究雄辯地說明法國革命的內容與形式、目的與手段，革命民主與革命恐怖之間的內在矛盾<sup>①</sup>。傅瑞的研究使人們得以全新的眼光思考法國革命，同時也使人們以新的眼光來看現實，重新思考共產主義革命及其失敗。將對法國革命的研究向共產主義革命領域推延，尋找法國革命與俄國革命之間的異同及其繼承性，是傅瑞研究視域轉移的內在邏輯。《歷程》一書共分十二章，傅瑞在第一章〈革命激情〉和第三章〈十月的普世魅力〉中對此進行了探討。

法國革命與俄國革命有甚麼共同點？第一個回答就是二者都是革命。甚麼是革命？傅瑞解釋道<sup>②</sup>：

革命同時是日常秩序的斷裂和集體幸福歷史前程的許諾。革命是十八世紀末法國人的發明，隨後即成為歐洲和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中心角色，它首先強調在政治活動中人的意志的作用，人可以拋開自己的過去發明並建設一個新社會，革命不僅可以證明人的意志的決定作用，甚至也是其保證。

如果說從法國革命到俄國革命有一個相連的靈魂的話，那麼，創造一個新世界、創造一個新人類便是這一共通的靈魂；如果說二者之間有某種共同的革命精神的話，那

在法國，法國革命研究一向與政治黨派關聯甚密。不過，傅瑞的過人之處是在此領域力倡獨立思想傳統，將法國革命研究帶出法國的左右政治鬥爭框架，一反對大革命要麼全盤肯定要麼全盤否定的模式，主張對大革命作具體分析。

十月革命借助了法國革命的餘暉，重新燃起了革命的激情。如果說法國革命與俄國十月革命之間有甚麼傳承的話，那首先就是兩者都擯棄革命的內容，抽出革命的形式，置換革命的主題，利用了想像的、共通的革命激情。1917年的十月革命甚至二戰前後的法西斯的登台都是附着在革命的幻象之上的。

就是崇拜人的意志，崇拜人類在歷史發展中的主導作用。《歷程》一書的作者認為，由於革命將人放在歷史的中心位置上，正適合於近世社會宗教淡出的社會背景，捨棄了精神拯救的人類從革命中找到新的精神依歸，所以革命一經發明便具有震懾人心的力量，可以燃起人們希望改變現狀的激情而歷久不衰。法國革命同時伴隨着歐洲民主的誕生，其光焰照亮了整整一個世紀。十月革命正是借助了法國革命的餘暉，重新燃起了革命的激情。

從革命的激情或者從這一激情籠罩的革命幻象的角度看，這裏所說的革命靈魂和革命精神都僅僅是革命的形式、革命的思想方法，而非革命的內在含義。在傅瑞看來，法國革命乃是以個體自由、個人解放為內在驅動力的，它所建立的以公民平等為基礎的代議民主政治，是跟共產主義革命的集體主義、階級對抗、政黨專政正相反對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說法國革命與俄國十月革命之間有甚麼傳承的話，那麼首先就是這種擯棄革命的內容，抽出革命的形式，置換革命的主題，利用了想像的、共通的革命激情。

《歷程》一書並沒有重點討論法國革命與俄國革命的異同，因為作者比較法國革命與俄國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澄清革命這一幻象的形成與內容，而不是革命本身的內容。作者也比較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sup>③</sup>：

這兩個革命的思想內容是一樣的，激情也是可比的，近代民主文明基本上是由這兩次革命建立的。但一

個以制訂和通過了一部憲法而結束，而這一憲法至今仍然有效；另外一個則制訂了多少部憲法並多次出現政權的變換。……法國革命留下的意涵與其說是一個制度向另一個制度的過渡，兩個制度的交匯點，不如說是一種同民主不可分割的政治文化，這種文化為追求平等的激情所驅動。永遠無法達到憲法與法律的終點，因而是永遠無法完善的。

換句話說，法國革命之所以較美國革命更具吸引力，乃是因為它有着一種趨向至善的內在動力。這種動力使革命的形式具有了獨立的生命，從而令革命的內容和形式的分離成為可能，最終導致作為形式和手段的革命成為一種信仰。這正是革命幻象的成因。

在傅瑞看來，對於整個十九世紀及其後的歐洲各民族來說，法國革命的幻象的影響與魅力遠遠超出其實際內容。1917年的十月革命甚至二戰前後的法西斯的登台，都是附着在革命的幻象之上的（雖然十月革命要推翻的是資產階級社會，法西斯要摧毀的是法國1789大革命的理念，二者皆同法國革命的思想內容背道而馳）。

## 不斷革命的衝動與意識 形態神話

《歷程》一書的主旨是為共產主義的幻象立傳，而在傅瑞看來，共產主義幻象的實質，則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神話。上述有關法國革

命與蘇俄革命的比較論述，主要是對革命幻象形成淵源的疏理而較少觸及意識形態本身的問題。

意識形態是一個備受爭議的概念，傅瑞在《歷程》一書中給出了一個定義，其含意與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大師阿宏 (Raymond Aron) 的定義相近。傅瑞指出④：

所謂意識形態，在此我是指那些解釋世界的理論體系，通過這些體系，人類可以排除任何神靈指引而使自身政治活動合乎自然法則。

如果說法國啟蒙運動使西方社會漸漸擺脫宗教與神權的束縛的話，那麼將思想體系付諸政治實踐也是隨着法國大革命而登場的。傅瑞認為意識形態在法國革命中的力量是不可忽視的，尤其是從革命幻象的角度來看更是如此。不過，《歷程》一書明確指明，意識形態雖在法國革命中佔有重要位置，但那不過是思想體系指導革命行動的肇端，遠不能同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革命和法西斯—納粹政權同日而語。以意識形態建立政權是人類在二十世紀的首創。

從法國革命開始，意識形態在人類政治史上走過的是一個凱歌行進的歷程，一直到希特勒納粹政權和蘇俄共產主義將其推向極端。意識形態在近代的興盛自然有着各種政治、經濟的動因，但它為何能夠在社會大眾和知識精英兩個層面都具有強大的動員力量並激起類似宗教信仰的熱狂，則是一個令人困惑的謎。傅瑞在《歷程》中闢專章分析歐洲知識精英對共產主義的態度，

他對法國知識界人物巴斯卡 (Pierre Pascal)、政界人物蘇瓦林 (Boris Souvarine) 和匈牙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盧卡奇 (Georg Lukács) 的心路歷程都進行了細緻的剖析。

傅瑞曾經是一個虔誠的共產主義信奉者，他在此書前言中甚至聲明他所謂的「幻象」曾經也是他自己的幻象。因此可以說，《歷程》其實也是作者走出幻象的心路歷程。從該書對列寧、斯大林主義的論述來看，傅瑞是對馬克思主義做過深入研究的。從法國觀察共產主義的興衰演變，我們不禁會問：像紀德 (André Gide)、阿拉貢 (Louis Aragon)、馬爾羅 (André Malraux)、薩特 (Jean P. Sartre) 這些傑出的作家、思想家如何會墜入共產主義的迷河而不能自拔？同樣的，像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 這樣的一代哲人又如何會被希特勒征服？

這一問題自然是一個世紀大問題，共產主義曾在全世界喚起無數人的擁戴，對此進行全面的回答恐還有待於更多的研究探討。《歷程》一書提出了自己的回答，我相信也是目前最為深刻和系統的回答。傅瑞認為在各種使知識人臣服於意識形態的因素中，最重要、最強大、最持久的心理因素是對資產階級的仇恨。這種仇恨深深植根於社會，持續整個十九世紀，一直到二十世紀匯成火山迸發。列寧和希特勒都將資產階級看成是世界萬惡之淵藪，並將這種仇恨凝聚為巨大的思想動員力量。

資產階級為何？在傅瑞的筆下，資產階級就是現代社會的代名詞，正是由於它的誕生而埋葬了過

意識形態為何能夠在社會大眾和知識精英兩個層面都具有強大的動員力量並激起類似宗教信仰的熱狂，實在是一個令人困惑的謎。傅瑞認為在各種使知識人臣服於意識形態的因素中，最重要、最強大、最持久的心理因素是對資產階級的仇恨。

傅瑞認為法國革命存在着一種自由與平等的內在緊張。正是從這裏，他看到某種意識形態專政現象的萌發。1792到1793年的恐怖時期難道不是一種以暴力強制達到某種烏托邦之目的的嘗試嗎？也是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說，法國革命開創了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先聲。



去的一切舊秩序。它無視傳統、無視等級，只承認財富的價值，將人與人的關係建立在唯一的經濟標準之上；它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平等、自由、人權、個體獨立，然而它所製造的則是不平等。前現代社會明確宣稱其不平等，因其合法性來源於宗教、天意、傳統；而資產階級雖以平等為號角摧毀了舊秩序，但卻創造了有史以來最為不平等的資源分配。由資產階級創立的現代社會正是這樣一個人格分裂的社會：自由與平等、口號與內容、法理與實質的空前分裂，甚至互為矛盾。對資產階級的仇恨不僅來源於其道德與行動的分裂，更多的是由於其偽善，因為它以堂皇的口號

激起人們對現代社會的嚮往，又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將這一嚮往扼殺。

傅瑞對資產階級的分析是《歷程》一書中最精彩的段落之一，因為它揭示了今天西方社會危機的最基本原因。傅瑞將問題上溯至十八世紀，認為法國革命存在着一種內在的緊張。雅各賓俱樂部成員是主張自由經濟的，但同時又對自由經濟的結果——社會財富佔有的不平等深惡痛絕，以自由名義進行革命，又以革命的名義建立平等。這種自由與平等的內在緊張導

致一種不斷革命的衝動。由於自由的結果是不平等的，因而必須以革命的手段再次打破不平等。這種不斷革命的衝動可能極度發展而達致一種平等的專制主義的出現。正是從這裏，傅瑞看到法國革命中某種意識形態專政現象的萌發。1792到1793年的恐怖時期難道不是一種以暴力強制達到某種烏托邦之目的的嘗試嗎？也是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說，法國革命開創了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先聲。

由於資產階級集現代社會的緊張於一身，因而對資產階級之恨不過表達了人們對平等之追求。正是因此，以社會平等為出發點和終極目的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便具有了

空前的凝聚力。追求平等的道德力量自然不能為共產主義所獨佔，但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無產階級誕生之前的平等要求都是空想，而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則是科學。換言之，共產主義信仰之所以能如此堅固和具有臣服力，是因為其集科學與道德於一身。它是歷史的規律，又是正義的化身；既是理性的世界觀，又是社會的價值體系；它不是宗教，卻比宗教更為寬宏，因為宗教的拯救以否定人為前提（原罪）；它是科學但卻沒有科學的缺失，原因是科學不能解決價值問題。一句話，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乃是人類所能找到的盡善盡美的思想體系與價值系統。

## 從德國納粹到蘇俄 共產主義

在柏林牆倒塌後的今天看來，共產主義既然是至善至美，那麼它注定是一個烏托邦。然而在經過民族仇殺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歐洲人，則渴望着將這一烏托邦付諸實踐。列寧正是在此時應運而生，十月革命吹響了在地上建立天國的號角。

傅瑞雖然認為法國革命曾企圖用暴力達到某種意識形態目的，但法國革命並沒有內在統一的意識形態，更沒有一套實施意識形態的制度手段，更為關鍵的是，法國革命各階段、各派別領袖也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目標。十月革命則不同，它是一場有理論、有綱領、有組織、有政黨、有領袖的政治奪權運

動，是一場以實現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為目標的社會系統工程。如果說法國革命中已有某種烏托邦的思想在閃光的話，那麼俄國十月革命則是以建立一個烏托邦的人類社會為職志的。從想像世界的烏托邦過渡到現實世界的烏托邦，其間是有着質的區別的。如果不惜一切手段、調動一切力量來達致這種烏托邦，一種全新的政治形式便會脫穎而出，這就是由阿蘭特（Hannah Arendt）後來所定名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sme）<sup>⑤</sup>。極權主義也是一種專制主義，同其他專制形式不同的是它要求被專制者對專制制度及其領袖的信仰，並以某種意識形態的力量來達到這一目標。從這一意義上講，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和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都是典型的極權主義。

《歷程》一書在極權主義問題上着墨很多，有一些結論也不無爭議，但該書對關於極權主義研究的重要成果作了系統發掘，其中對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德國納粹主義和蘇俄共產主義作了較全面的比較，筆端所及，也談到中國與古巴的極權主義。可以肯定，該書將是今後研究極權主義所不可跳過的著作。從目前的研究看，極權主義一般有四個特點：一黨專政、國家壟斷經濟、意識形態專政和警察恐怖，傅瑞顯然更為重視意識形態專政這一特點，並認為納粹政權和斯大林政權是將意識形態專政推到極致的兩個政權。一方面，這兩個政權都「通過個體對意識形態的絕對服從和一黨恐怖統治將社會秩序徹底摧毀」；另一方面，也唯有這兩個政

共產主義運動在各國的實踐史讓我們看到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凡是共產主義成為正統意識形態的地方，任何不同的思想都會受到清洗。原因十分簡單，因為任何不同的聲音都會打破那個盡善盡美的意識形態神話，從而動搖立足其上的那個政權的根基。

權製造「黨與人民緊密團結的神話和領袖崇拜而導致數以百萬計的生靈塗炭，並毀棄整個民族的發展生機」<sup>⑥</sup>。

如果將意識形態統治看作是極權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的話，我們可以看到意識形態有一種內在的排他邏輯。由意識形態指引的革命運動不僅規定革命的方向，而且還要獨佔對革命的釋義。對革命意義的闡釋權不僅僅是革命黨的專利，而且必然導致革命領袖的闡釋高於一切的結果。意識形態政權不僅要求人們對意識形態本身的絕對信仰，也要求對領袖闡釋的正確性的絕對服從，並不惜以行政、暴力手段維護之。共產主義運動在各國的實踐史讓我們看到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凡是共產主義成為正統意識形態的地方，任何不同的思想都會受到清洗。為了維護意識形態的一統天下，政權不僅剝奪了人們自由言論和思想的權利，甚至企圖根除人們獨立思想的能力。原因十分簡單，因為任何不同的聲音都會打破那個盡善盡美的意識形態神話，從而動搖立足其上的那個政權的根基。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一個政黨通過國家的力量強行將某種烏托邦付諸實踐之時，也就是極權主義政權產生之日。

《歷程》一書在比較德國納粹和蘇俄共產主義時，指出了一系列極權主義所共有的特點：如以政黨代替國家，控制社會的一切，從思想到宗教、文化，從經濟到私生活，杜絕一切個人自由，窒息個人生機，將資產階級民主、金錢的暴政視為敵人等等。該書轉述了德國

哲學家顧林 (Waldemar Gurian) 於 1935 年出版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前途》(Bolshewismus als Weltgefahr) <sup>⑦</sup> 一書的內容，對理解納粹和蘇聯共產主義的異同頗有啟發，值得一提。顧林這部書認為納粹和蘇俄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因為二者都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只不過一個是褐色的，另一個則是紅色的。顧林的書其實在阿蘭特正式提出極權主義概念前十幾年就已經接觸到極權主義的本質，他對納粹和共產主義蘇俄作出了區別：第一，蘇德兩國時代背景殊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以「科學」自我標榜，但科學是十九世紀的時興思潮，只能適合於俄國這種落後國家的現實，但德國是歐洲的先進國家，科學主義當時已沒有市場，這裏的知識過於發達，人們要衝破理性與文化的專政，這是希特勒得以成功的社會文化背景；第二是意識形態應作為手段還是作為目的的問題。希特勒公開宣稱意識形態僅僅是他奪取政權的手段，而共產主義則宣布意識形態是目的，共產黨奪取政權乃是為了實現意識形態之目的。

從手段與目的的角度來分析共產主義，可以看到，如果說共產革命是為了實現其意識形態宣稱的那個盡善盡美的烏托邦，而革命初期的共產黨人又大多是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理想而投身其中的話，那麼等到這一理想幻滅，意識形態就成為赤裸裸的維持政權的手段，此時的共產主義就「降格」為納粹政權。如果說以意識形態為手段來奪取和維持政權是納粹法西斯的發明的話，那麼以意識形態為目的來奪取和維

如果說共產革命是為了實現其意識形態宣稱的那個盡善盡美的烏托邦，那麼等到這一理想幻滅，意識形態就成為赤裸裸的維持政權的手段。這裏，目的與手段實質僅有一步之遙。實際上，在共產主義的極權制度下，意識形態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持政權則是列寧的專利。這裏，目的與手段實質僅有一步之遙。實際上，在共產主義的極權制度下，意識形態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作為目的，它可以激發出民眾的精神熱狂進而產生強大的物質力量；作為手段，它又可以成為箝制言論、鎮壓反叛、鞏固政權的有效武器。從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淡出歷史舞台的今天看來，意識形態乃是共產極權制度的靈魂與生命，共產政權不得不調動思想的、組織的、行政的(包括武力的)手段維護它。共產主義的最大歷史悖論也許在於它本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為強大的思想體系，但卻又是極其脆弱，只要出現任何小的異象和變數，都有可能成為大廈崩毀的最初缺口。

## 極權主義的文化背景問題

《歷程》一書以大量的篇幅、詳盡的材料和精辟的論證，為我們描述了列寧逝世之後斯大林怎樣以「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來強化共產主義的信仰，怎樣利用反法西斯的戰役來增強蘇聯的信譽，東歐蘇聯陣營怎樣因為鐵托的出現而打開缺口，又怎樣隨着斯大林的逝世、赫魯曉夫的上台而漸漸走向衰敗，尤其是赫魯曉夫以後蘇聯怎樣由極權主義國家向警察恐怖國家轉化、由意識形態統治蛻變到暴力專政，所有這些都為我們理解共產主義的消去以及中國今天的現實提供了十分有價值的參考。不過，限於本文的篇幅，我們不能在此逐一介紹。作為本文的結束，我

僅就《歷程》一書作者雖有觸及但卻未能深入的極權主義的文化背景問題談談我的一些想法。

自50年代初阿蘭特完整提出極權主義概念以來，極權主義便成為西方政治學中的顯學之一，歐洲思想尤其是法國思想界對極權主義概念雖有保留，但對其基本要點仍然有共識。一般認為，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是最典型的極權主義政權，意大利法西斯和西班牙佛朗哥主義次之，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意識形態層面也存在着重要區別，但並沒有改變其極權主義性質。到目前為止，對極權主義的研究，尤其是對極權主義運行的描述、對其機制的分析雖已取得重大成果，但對它的成因、淵源、條件等則仍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尤其從文化背景上看，極權主義仍然是一個謎。

從納粹在德國的勃發到共產主義在歐洲的戛然消逝，極權主義像是秋天的陣雨、無根的浮萍，來無徵兆，去無蹤迹。它可以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之根上，德國、俄國、中國，但其產生的結果卻基本一致——專政、全面專政、毫無思想空間、所有社會現存體制全部被摧毀。德國的市民社會，俄國的傳統封建結構，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建制(文革時)等等都無法抵抗極權風暴的威力。德國納粹與共產專政的運行機制有着驚人的相似性，但其文化基礎又是如此之不同。如果說納粹德國的興起植根於某種現代民主危機(個人主義的極端發展、工業社會人性的異化等)，俄國是因為落後的反彈，那麼共產主義在中國崛起的原因又是甚麼？文革又是

到目前為止，對極權主義的研究，尤其是對極權主義運行的描述、對其機制的分析雖已取得重大成果，但對它的成因、淵源、條件等則仍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尤其從文化背景上看，極權主義仍然是一個謎。

甚麼原因造成？是出於對大同前景的嚮往？是要重建過去的帝國榮光？抑或是為了維持政權的需要？

共產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專政，專政的力量既是精神的又是組織行政的，既是無形的又是有形的，既有宗教的地位又無宗教的超越，這些特點同中國長期儒家意識形態與王朝政權的結合的特點互相契合。共產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國紮根，同儒家傳統應該不無關係。然而，共產主義是一種極端的精神創造，尤其是馬克思以後的共產主義，它是西方工業化時代的產物，是科學昌明時代的產物，是將科學主義移植於社會領域的產物，是與資本主義社會相對立而出現的產物，是科學走向極致的產物。從這一意義上講，儒家意識形態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結構則是一種調和、一種中庸，是宗教與世俗的融會，是道德與秩序的調適，是過去、現在、將來的共通。回頭再來看共產主義，它是極端的、全能的，它雖然不是宗教，但卻要佔有宗教的位置和權力；它是世俗的，但卻帶有一種地上的超越。它企圖改變人類的思想精神，這與基督教（一神教）的拯救如出一轍。宗教的排他僅僅是精神層面，共產主義的排他卻更在宗教以外的世俗社會，既不能容忍不同思想、不同學說，也不能容忍個人創意和政權以外的組織，它是一種以消滅其他可能的社會形式為己任的排他的學說和制度，一種排他的最高形式！正是因此，中國才有了文化大革命這樣極端的運動。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文革雖同中國的歷史傳統有一定淵源，但

卻是因為西方形式的導入而走上了極權的頂峰。不過這樣一來，我們又回到了問題的起點，極權主義的根源仍然無解。

在目前極權主義的研究中，只有對中國極權主義的研究仍然空白。也許有一天，中國的學者能夠回應這一挑戰，在對中國極權主義的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對極權主義的解釋。

#### 註釋

① 傅瑞有關法國大革命的著述頗豐，較重要的有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Gallimard, 1978),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Flammarion, 1988) 等。

②③④⑥ François Furet, *Le passé d'une illusion: Essai sur l'idée communiste au XX<sup>e</sup> siècle* (Paris: Robert Laffont/Calmann-Lévy, 1995), 46; 25; 19; 217.

⑤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51).

⑦ 顧林 (Waldemar Gurian, 1902-1954)，德籍猶太裔哲學家，其著作《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前途》於1935年在瑞士小城盧塞恩 (Lucerne) 出版時，正值他從德國逃到瑞士躲避納粹的迫害。

正動筆撰寫此文之時，傳來傅瑞於今年7月12日辭世的噩耗，先生終年70歲。他的巨著：《一個幻象的歷程——論二十世紀共產主義思潮》於是成為他的絕世之作，筆者謹此表示哀悼。

陳彥 法國巴黎大學歷史學博士